

中国历法三正论、殷历、周历、干支纪年起源考

何 爱 华

一、引言

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《史记·历书》曰：“夏正以正月，殷正以十二月，周正以十一月。盖三王之正若循环，穷则反本。”^①在历史上，这是中国“三正论”的最初由来。本世纪20年代末，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《东洋天文学史研究》^②一书，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，国与国间，官颁与民用间，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，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“三正论”，为“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”上“系累非浅”的“憾事”。而新城新藏此说，为张汝舟先生^③所接受，著有《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》一书。他在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》一文的参表解中，将“三正论”与“岁星纪年”、“四象”、“三统”等，并列为“四害”之一。我认为，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“三正论”的否定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司马迁以来的“三正论”，至少在春秋时期还是存在的。至于历法上的殷历、周历和干支纪年起源等，亦并非尽如新城新藏、张汝舟等人的观点。为此，笔者撰文探讨，就正贤达。

二、三正论考

新城新藏在《春秋长历的研究》中认为：“关于三正论之文献，由来颇古，然由研究春秋长历之结果，可知其断非春秋以前历史上之事实。余以为，盖在战国中叶以降，将所行之冬至正月历（建子）拨迟二个月，改为立春正月历（建寅）时，因须示一般民众以改历之理由，遂倡三正论而笃宣传耳。其后，因秦代施行十月岁首历（建亥），更加汉代宣传，遂至认三正之交替真为上古历史之事实。时至今日，信者尚不乏人，此于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之阐明，系累非浅，诚可谓憾事。”对此，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曾提出争议。他说：“所谓三正论系出于后人捏造，毫无疑问，唯造此说之时代不当在战国中叶，而在春秋末年。孔子已在主张（行夏之时），足见当时改历之要求已相当普遍，存世有《夏小正》一书，大抵即为春秋时代的历术家所拟述的私人计划。此种时宪早为学者所倡导、所公认，特为政治力量所限制，直至战国中叶，始见诸一般的实施而已。”^④以上两种不同观点，其焦点在于：虽然新城新藏声称：“可知其（三正论）断非春秋以前历史上之事实”，似乎亦承认春秋时期有“三正论”的存在，但他认为，这是汉代人的“笃宣传耳”。所以“三正论”就只能是“盖在战国中叶以降”了。因此，郭沫若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认为，一方面孔子主张“行夏之时”，已在战国之前；另一方面，存世有《夏小正》一书为证。据此，可以认为至少在春秋时期，“三正论”还是存在的。上述郭沫若的观点，仅举孔子主张“行夏之时”和存世有《夏小正》一书为证，但只举这种实例，还是不够的。这里，我所提出的证据，基本上是出自于张汝舟先生本人著述中的材料。张汝舟的《否定三正论》一文认为：“取拙著《春秋经朔谱》验之，隐公三年寅月己朔，经书‘二月己日有食之’，必是建丑为正；桓公三年未月定朔壬辰，经书‘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’，必是建丑为正。《春秋》一般纪日，也能定月建，例如桓公六年申月经朔乙亥，酉月经朔甲辰，经书‘八月壬午’，‘九月丁卯’，壬午是申月初八，丁卯是酉月二十四，必是建丑为正。据此铁证，考出春秋初期是建丑为正，建子为正必是僖公以后事”。上述隐公三年、桓公三年、桓公六年等三年的月建，经与王韬的《春秋长历考证》、《春秋朔闰表》^⑤相核对无误。这足以证明，“三正论”在春秋时期，还是存在的。

另外，张汝舟先生也说过：“失闰、失朔，春秋有宝贵的资料”。他在以“昭公十五年经朔”为例后说道：“这一年必是建亥为正，春秋后期建子为正。这是春秋后期失闰的铁证。我们研究的结果，隐公、桓公、庄公、闵公共六

① 司马迁：《史记·历书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255—1262页。

② [日]新城新藏：《东洋天文学史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3年版。

③ 张汝舟：《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④ 郭沫若：《青铜时代》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，第114—115页。

⑤ 王韬：《春秋历学三种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

十三年,有四十九年建丑,八年建寅,六年建子。僖公、文公、(宣公)、成公共八十七年,有五十八年建子,十三年建亥,十六年建丑”。他还概括地说:“前四公没有建亥的,后四公没有建寅的。”上述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、文、宣、成共鲁八公,150年,按照张汝舟的研究,共有建亥13年,建子64年,建丑65年,建寅8年。按照王韬的研究,建亥12年,建子69年,建丑68年,建寅1年。可是,春秋时期,共有245年,还有九十五年,张汝舟没有资料,只好以王韬的成果来填充这一段空白。这样,按照王韬的成果,在春秋时期的245年中,建亥24年,建子151年,建丑69年,建寅1年。

总的说来,在春秋245年中,有建亥24年,建子151年,建丑69年,建寅最少,仅有一年,亦是以说明,“三正论”在春秋时期,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。

在这里,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,这就是“历与历法不是一回事”,两者不容混为一谈。只要明白了这一点,对于“三正论”,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。在我看来,自司马迁以来的“三正论”,只是说,在《日书》,即《日历》,用郭沫若的话说,在《时宪》上,有“夏正以正月,殷正以十二月;周正以十一月”的“建寅”、“建丑”、“建子”的不同,而不是说,夏、商、周三代,各自有一套“建寅”、“建丑”、“建子”的制历法则、法规。因此,我认为,自司马迁以来所说的“三正论”,只不过是说,在《日书》上,夏、商、周三代,分别各有所谓的“正月”(建寅)、“十二月”(建丑)、“十一月”(建子)为“月建”,为岁首而已。至于各自使用何种历法来建立其《历书》,即《日书》、《时宪》、《日历》,则是另一问题。

三、殷历考

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上,我认为,张汝舟先生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这主要表现在,他正确地把司马迁在《史记·历书》中所记载的《历术甲子篇》,班固《汉书·律历志》中所记载的《次度》这两种古代天文学上的珍贵资料发掘出来,并予以正确地阐释。其主要成就,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,一是张汝舟在《〈历术甲子篇〉浅释》、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》两篇主要论文中,以《历术甲子篇》和《次度》为依据,在陈遵妫《天文图表》和宋人黄裳《星图》二十八宿次序的基础上,制成了图表。

照张汝舟的学生张闻玉说:这个图表有四点突出成就:(1)、二十八宿的运行与二十四节气的配合取得一致;(2)、北斗柄方向与四季方向、二十八宿的运行方向吻合;(3)、否定“岁星纪年”; (4)、明确岁差与岁差方向。二是依据司马迁《史记·汉书》保留下来的《历术甲子篇》:“太初元年,岁名‘马逢摄提格’,月名‘毕聚’,日得甲子,夜半朔(旦)冬至”的“历术”之法,以及《汉书·律历志》刘歆《三统历章节表》所提供的:十九年一章,四章一节,共七十六年;二十部一纪,共千五百二十年;三纪一元,共四千五百六十年;为一个历元周期。推定公元前427年,周考王十四年“岁在甲寅”,为“甲寅元”,为“中国干支纪年之始”。从此,“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”,而结束了“观象授时”的时代。对此,他说:“战国时代各国都是用四分法的《殷历》——即假殷历,真夏历的《历术甲子篇》。《历术甲子篇》每年以‘干支纪年’,起于甲寅年,实为真夏历。它创始于周考王十四年,即公元前427年。其所以用《殷历》之名,因为周考王十四年年前十一月朔夜半冬至无余分,可是这一天是‘己酉’,不是‘甲子’,只能定为新创之历的‘近距’,必须前推出一个‘历元’是甲寅年年前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(夜半)合朔冬至。那时创造第一部历法的人,还不知道‘纪元’这个把戏,只有托古改制的思想,他们利用《古文尚书·伊训》:‘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,伊尹祀于先王诞膺有牧方明’这一历点为这部历法造出一个假的‘历元’,从而冒名称为《殷历》,实际是夏历”云云。这也是张汝舟的主要成就的一个方面。但对此,须要做出三点说明:(1)、主张以公元前427年,周考王十四年为“甲寅元”的历元,并不始于张汝舟。尽管受条件所限,了解的不够详尽具体,但仍可知最早持此说者为日本的饭岛忠夫先生,早在1926年,他就在《东洋学报》上提出了这一看法。(2)、既然“周考王十四年年前十一月朔夜半冬至”,“这一天是己酉”,而不是“甲子”。那么,根本就不存在周考王十四年为“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(夜半)合朔冬至”的事实。因此,要找到一个真正的“甲寅年年前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(夜半)合朔冬至”来,按照刘歆《三统历章节表》的规定,就必须以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周期,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真“历元”来。所以,张汝舟所谓的“甲寅元”的“历元”,仍只能是一个“近距”的假“历元”而已!(3)、即使张汝舟所说的“历元”成立,亦不宜称这种历和历法为“假殷历、真夏历”。因为,我们知道,这种历和历法的实质,是阴阳合历的历和历法。它从殷代一直沿袭到汉代。所以,对这种历和历法,只能称为殷历,而不能不从历法的实质来考察。

中国自殷代开始就有阴阳合历的殷历和历法。而这种历和历法,又似乎仅为中国所独有。按照张汝舟的说法,在周考王十四(公元前427年)以前,这种历法,只能是“观象授时”的,在这以后,“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”。我认为,这种历法从殷代(公元前1600年)到战国周考王十四(公元前427年),已经建立并实施一千多年了!故尔不能说中国还没有“进入历法时代”。而只能说,周考王十四年以前的历法,单纯是“观象授时”的,周考王十四

年,结束了单纯以“观象授时”的时代,而中国的阴阳合历,从此进入了与测算相结合的新时代。在中国,这种阴阳合历的历法,到汉武帝太初元(公元前104)年,经过司马迁主持改为《太初历》,而日臻完备,一直沿用至今,并一直被称为“夏历”。

按照司马迁《史记·历书》的记载:在春秋战国时代,由于周室微,君不告朔,畴人子弟分散,或在诸夏,或在夷狄等原因。不仅有夏正建寅,殷正建丑,周正建子的“三正论”等三种历,而且还有建亥的《颛顼历》。并且更有所谓“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”的“古六历”。在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的潮流中,天文历法,一时呈现令人头昏目眩的错综复杂状态。对于古六历,虽为托古之作,不论其内容及年代如何,不能尽视为凭空伪造的。因此,对于古六历,潘鼐有这样的评价:(1)、它们不是凭空而起,而是有所传承有所本,或者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入所观测的资料而制订的。(2)、它们所采用的冬至点是原有的,系根据观测而得的资料,不是假设的。^①我认为,这样的评价是很公允的。根据这个评价,我们说,在年代上,新城新藏认为,《颛顼历》制定于公元前440年,修改于公元前360~公元前350年间。而潘鼐以推测出殷历和颛顼历所用的冬至点,殷历为牵牛初度,颛顼历为牵牛一度或一度余,而略有不同。说明颛顼历与殷历,是属于同一历法的。只是岁首所在月份,与“三正论”所谓月建相同,各在不同月份,而以“十月”为岁首而已。晋人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指出:汲冢人发掘战国魏襄王墓《竹书纪年》记载,上自公元前八世纪的晋殇叔(公元前784~公元前781年),下至公元前三世纪的魏襄王(公元前318~公元前296年)“皆用夏正建寅为岁首,编年相次”。王韬根据对历学的研究,以大量事实证明,春秋时期,“周不颁朔,列国之历各异”,故“秦晋皆用夏历,宋卫皆用殷历”。及至战国,秦用颛顼历,杨宽以云梦出土竹简《编年记》六个月的干支和《秦南郡守腾文书》开首年月及干支等,^②都和汪日桢《历法长术辑要》所推定的颛顼历相符合。林剑鸣指出:颛顼历建亥,虽以十月为岁首,但并不称十月为正月,也不改正月为四月,仍同夏历一样,以夏历之正月为正月。^③所以,其春夏秋冬四季和月份的搭配,仍与夏历完全相同,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。这还可由出土文物来证实。天水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^④中的《月建》,就是以正月至十二月为月次的一种建正表。这种建正表,始于正月建寅,始于十二月建丑。证明秦国所用的颛顼历,在历法上,和所谓夏历完全一样,是以正月建寅为岁首的。汉承秦制,秦帝国覆亡之后,西汉仍采用颛顼历,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。汉武帝太初元(公元前104)年,司马迁主持改历工作,改颛顼历为太初历,从历法来说,太初历在精确度上,当然要比颛顼历精密得多。但从实质上来说,仍是颛顼历的继承和发展。从太初元年,一直到解放前,中国主要用的就是这种阴阳合历的历法和依这种历法制定的《日书》、《时宪》、《日历》,并被称为“夏历”。无论是被张汝舟称为假殷历、真夏历,或司马迁、刘歆、杜预、王韬、杨宽、林剑鸣等等,任何人所称之“夏历”,在历法上,只要是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,不论其岁首是建丑,建寅,还是建亥,就历法而言,与其说是夏历,不如说是殷历,其根据和理由更充分一些。

四、周历考

张汝舟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上的主要成就,已如上述。他的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》一文,共制订三份《表》,《表二》的成就,已做了较充分的评论。《表一》已由张汝舟作了说明,是中国天文历法上的传统东西,而不是张汝舟的创作,自不必去议论。对《表三》,不能不在这里,进行必要的讨论。《表三》是以《尧典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礼记·月令》为基本素材制定的。由于《尧典》仅有四个月份的星象载录,仅为一年的三分之一,每三个月只有一次星象载录,因此,不足以论证全年历法。《礼记·月令》则为阴阳合历的殷历历法,似亦无可争议。

但从《夏小正》来说,则不尽然。尽管张汝舟在《〈夏小正〉校释》中,一再说:“正月‘初昏参中’,其为建丑之月无疑。此《小正》为殷正之铁证也”。“末月为七月,则正月为丑月,《小正》之为殷正明矣”。但有两点是自相矛盾的。其一,纵观《夏小正》按殷历或所谓夏历历法,只有二、十一、十二,三个月没有星象载录。二月谓:“古人于中流伏内甚为熟谙,正月记参中,三月记参伏,则二月为参流,不言可知。犹火记伏内,中与流亦不记也。此古人文字互见之妙”。这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和相信的。但若说“十一、十二月不记星象,其所述理由:“(一)、已记十月,闰否已可定矣。十一、十二月但置一小月、一大月,已无差失。(二)、次则农事已毕,无所资于星象。复收一之日发,二之日栗烈,旦昏亢寒,凭高观测,亦非所堪”,这是我所不敢相信的。我认为,这两点,并不能构成

① 潘鼐:《我国早期的二十八宿观测及其时代考》,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3期,第171、181页。

② 杨宽:《战国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451页。

③ 林剑鸣:《秦史稿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302—303。

④ 何双全:《天水放马滩秦简概述》,载《文物》,1989年第2期。

十一、十二两个月份,六十余日,占全年六分之一的时间,连续不观测、不记载星象的理由。与此恰恰相反,尤其到年终,为了准确地确定“日得甲子,夜半朔(旦)冬至”,以为下一年之始。因此,对这两个月里的星象观测、载录,只能加强、抓紧。决不能以“已记十月,闰否已可定矣”,或十一、十二月之大小“已无差失”为理由,而削弱、放松。至于“农事已毕”,而不需要观测、载录星象,或“旦昏尤寒”,“亦非所堪”的理由,更是难于成立。其二,《夏小正》有九月“五始裘”。这一点,张汝舟似已看出破绽。他说:“《诗·七月》:‘九月筑场圃,十月纳禾稼’,十月为秋收之候,尚非衣裘之时,《月令》孟冬之月‘天子始裘’,则为《小正》十一月。此在九月,疑有错简”。看来,张汝舟在这样的矛盾面前,只有求助于“疑有错简”了。然而,《夏小正》所反映的历法,既不是所谓建寅的夏历,亦不是建丑的殷历。《夏小正》的十一、十二两个月份,没有星象观测、载录的矛盾,依然不能解决。至于《豳风·七月》,张汝舟在《表三》中,把它同《夏小正》错后一个月。这不仅不能证明《尧典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礼记·月令》同为殷历历法。而适得其反,更加暴露了《豳风·七月》与《礼记·月令》之不同。而且有益于《豳风·七月》的科学价值。这样,尽管在金文中,往往以“初吉”、“既生霸”和“既望”、“既死霸”纪日表明为太阴历或阴阳合历。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亦无三十一日或三十六日等十月太阳历的子遗可寻。但我坚信,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夏小正》所反映的历法,既不是阴阳合历的十二个月的殷历历法,也不是阴阳合历的十二个月的夏历历法。而只能似为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^①等所发现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十月太阳历历法。而这种历法,从古代来说,或许就是周历,从当代来说,或许就是彝族太阳历。

彝族太阳历虽然十分古老,但鲜为人知。自1934年,常隆庆、施怀仁、俞德浚^②去四川凉山地区进行科学考察,始有关于彝族太阳历的报告和信息。在1938~1939年,李亦人^③续有相似的报告。相继江应梁教授^④在1940年亦做过科学考察,并撰写报告。解放后,在《彝族简志》、《傈僳族简志简史合编》等著述中,亦有报告。但这些早期发现和报告,由于涉及彝族太阳历的部分,文字过于简略。因而都被当作少数民族的民俗和封建迷信而被埋没,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。直至70年代,刘尧汉、陈久金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,撰述专论发表,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探讨,指出了它的基本结构,存在的确实根据和科学价值等。但因尚未提出新的证据,人们仍信疑参半。甚至有人写文章否认和反对。因此,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等遂深入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、云南进行深入地调查和研究,并撰写成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论专著。并在天文学界受到张钰哲、杨苴和潘朔^⑤等的高度评价,而被誉为“开辟了中国科技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”。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等在上述专论专著中,即主要以《夏小正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和《管子·幼官篇》等为依据,从历法上考察和探讨了十月太阳历在中国的长期存在,并可远溯上至夏代。而且直至解放前,一直为聚居于西南川滇一带的彝族、傈僳、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所应用。其中尤以《夏小正》与十月太阳历的渊源关系,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等的专论、专著,分别从古代星象与气温、节气、物候等方面,特别是在古代天文星象上的科学论证,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夏小正》所反映的历法,就是十月太阳历无疑。但是,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等,并不以此为满足,仍孜孜不倦,奋笔不息,继续前进。

刘尧汉和陈久金在研究《管子·幼官篇》的基础上,又联系闻一多^⑥对“七十二”的考证研究,进一步以《管子·五行篇》对十月太阳历进行深入研究。刘尧汉和卢央亦以《管子·五行篇》对十月太阳历,进行深入研究。^⑦与此同时,陈久金更单独以《管子·五行篇》乃至“天干十干”,深入考察探索十月太阳历与五行、八卦,乃至天干十干的渊源关系。^⑧并以这种科学观念,对司马迁《史记》、《天官书》和《历书》等进行新的科学注释。通过这一系列的深入考察研究,十月太阳历的历史渊源和面貌,即被基本清理出来。十月太阳历,基本以十天干纪月,以十二地支,或十二属相纪日,每个属相周为一个节令。月由甲起,日由子起,即由鼠相起,每月三个属相周,共36日。以185日为半年。以奇数月为阳、为公、为雄,以偶数月为阴、为母、为雌。以每二个月,72日为一季(行),以五季(行),三十个属相周,即三十个地支,360日为一年。余下五、六日为过年日,不计入各月份之内。每四年置

① 陈久金、刘尧汉:《论彝族太阳历》,载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,1982年第3期。

② 常隆庆、施怀仁、俞德浚:《雷马峨屏调查记》,载《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》,北平大石作大学出版社,1935年版。

③ 李亦人:《西康综述》,正中书局1941年版,第106、110页。

④ 江应梁:《凉山彝族奴隶制度》,广州清华印书馆1948年版,第72页。

⑤ 潘朔(评《彝族天文学史》),载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1985年第4期。

⑥ 闻一多:“七十二”,载《神话与诗》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0年版,第207—220页。

⑦ 刘尧汉、卢央合著:《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6年版,第52页。

⑧ 陈久金:《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》;《史记》“天官书”和“历书”新注释例;《天干十干考》,均出自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,1986—1988年。

闰,为366日,平年为365日。一年过大、小两个年。这里须要说明,《管子·幼官篇》的三十节,既有与十月太阳历相合的一面,即其三十个节令与十个月,每月三个节令相合。也有不尽相合之点,《管子·幼官篇》起于地气发(立春),不起于冬至。并且将全年三十节配属四季,春季八节,夏季七节,秋季八节,冬季七节,与《五行篇》每月三节,十月三十节,明显不同,因之稍异于十月太阳历。

通过上述考察,似可完全说明,《鹖冠子·七月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管子·五行》所载的历法,决不是十二个月阴阳合历的殷历,或十二个月阴阳合历的“夏历”的历法。而恰恰是十月太阳历的历法。这种历法,以《管子·五行》和《夏小正》反映的最为清楚。从“三正论”来说,它就是“建子”的“周正”历法。当时在中国,至少说有周、鲁、齐等国,是在使用这种历法,以制定每年之历。从“古六历”来说,所谓“春秋历”,实即“鲁历”。我们在上述《三正论考》中,已经提出,王韬的春秋历研究,共有“建子”151年之多。由于张汝舟一再只强调《历术甲子篇》是“宝书”,而将“三正论”当做“四害”来否定,以致不相信司马迁在《历书》中对“三正论”和历法史的科学论述为事实,而只相信司马迁在《历书》中所转载的“宝书”——《历术甲子篇》为事实。

按照司马迁在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序中所说:“太史公读《春秋历谱谍》,至周厉王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呜呼,师挚见之矣!……历人取其年月,……谱谍独记世谥,其辞略,欲一观诸要难。于是谱十二诸侯,自共和迄孔子,表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,学者所讥,或衰大指著于篇,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。”据此,司马迁采取师挚的《春秋历谱谍》,自共和迄孔子,谱写365年的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。从历法来说,似即为采用十月太阳历的历法。从《三正论》来说,似即为“建子”的周正。因为《十二诸侯年表》,起自共和元年,岁在庚申(公元前841年),迄于周敬王四十三年,岁在甲子(公元前477年),凡365年,基本是十月太阳历一年的放大。已如上述,十月太阳历以十月为一年,36日为一月,一年共有360日,余五、六日为过年日。在历法上,甚是整齐,简洁易晓为优点。而《十二诸侯年表》,恰恰以十天干为核心,每十年逢甲,则立干支纪年,相当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为一年。共用天干36次,相当于十月太阳历的一个月36日。自庚申(共和元(公元前841年)至第一个甲子(共和五(公元前837年)的五年,相当于十月太阳历一年的过年日。自第一个甲子至最终的甲子(周敬王四十三(公元前477年)360年,相当于十月太阳历一年的360日。由于十月太阳历具有简洁易晓,整齐划一的优点,故可准确推知,这365年共为3650月,133266日,其中1866日为过年日,在过年日中有41日为置闰所增,余131400日为平日。由此经过压缩整理,而谱写成为365年的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“自共和迄孔子”,仍将周王朝列于首位,而以周王朝为主体、为核心的。因此,似完全可以说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所反映的历和历法,其实质即为“建子”的周历无疑。这样,张汝舟说:“‘三正论’的‘周正’建子,萌芽于春秋中期,末期才稳定;春秋以前,没有周历”之说,未必一定准确可靠。司马迁的《十二诸侯年表》,应为周人自西周中期厉王,共和元(公元前841年)以来,即应用周历——十月太阳历的一个铁证。而新城新藏所谓“三正论”为阐明“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”,“系累非浅”的“憾事”之说,似亦不能成立。而这一点,似乎亦可为陈久金、卢央、刘尧汉等进一步深入研究彝族太阳历,提供一条新的线索。

五、干支纪年起源考

吕子方先生在《我对新城新藏关于三统上元、四分上元及干支纪年起源的进一步看法》和《〈淮南子〉在天文学上的贡献》两篇论文中,^①涉及司马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时,分别以括号的形式表示说:“《史记·[十二]诸侯年表》等干支,乃刘宋时徐广所增。”或“《史记·[十二]诸侯年表》等的干支是徐广增注的。”对此,在我看来,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上的“干支纪年”,决不是“刘宋时徐广提增注”的。与此相反,恰恰是司马迁所著的原文。我的理由是:其一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上的“干支纪年”,是表格最上的一栏,这明明白白,是原表所设置的专项栏目,而决不是后人的“增注”。其二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上的“干支纪年”,是以十天干为核心,除共和元年特书“庚申”外,每十年逢甲,创立干支纪年,共用天干36次,事先制定出一定的格式,然后把历史事件,逐年纳入各该系年之下。其三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:“周:共和元年”,下,今本明文记载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自共和元年,岁在庚申,迄敬王四十三年,凡三百六十五年。”“四十三:敬王崩”下亦明文载有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岁在甲子”。这里,亦明明白白,是“徐广所增注”的注文。由此三点,足以说明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中的“干支纪年”,这一专项栏目内容,决不是“徐广所增注”的注文,与此相反,是司马迁著作的原文。

对此,我认为,不妨把视野略为扩大一点,从《史记》十表的全局,再进行一点考察辨析。司马迁《史记》共有十表,第一为《三代世表》,由于表中史绩,均无确切年代,而无须使用“干支纪年”来表示具体年代,当然与“干

^① 吕子方: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》上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139、153页。

支纪年”无关,而无须讨论。第三为《六国年表》,第四为《秦楚之际月表》,此两表虽均未设置“干支纪年”的专项栏目,用以表示“干支纪年”。但在“每王元年”下,裴驥《集解》均引有徐广曰:“乙丑”,或“岁在乙未”等,以“干支纪年”为“增注”的注文。因此,第三、四两表中的“干支纪年”,都是很明确的,显然都是“徐广增注”的注文,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第五表以下各表,均未使用“干支纪年”,亦未见有裴驥《集解》引用徐广注文,皆与“干支纪年”无关,亦均可置而不论。

对于第二、三、四等三《表》使用“干支纪年”,清人钱大昕的《十驾轩养新录》和张文虎的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》亦皆论及。钱大昕以第三、四两《表》的徐广注文,来解释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。因此,他说:“共和元年亦当有‘徐广曰庚申’字,今刊本乃于最上格书干支,而删去徐广注,读者遂疑史公文矣。徐注唯于每王元年记干支,此表十年辄书,并非徐氏之例”。分析钱大昕这番话,有以下几点:其一,钱大昕所见和所用的《史记》刊本,“共和元年”下,似乎没有裴驥《集解》所引“徐广增注”的注文,故曰“删去徐广注”。其二,钱大昕所谓该刊本“于最上格书干支”,使“读者遂疑为史公本文矣”。我以为,这不是读者“疑为史公本文”的,而是实质上,已如上述,这本来就是司马迁原著之文。其三,钱大昕说,“此表十年辄书,并非徐氏之例”。这话倒是很有见地的。这一点恰好说明,使用“干支纪年”专栏设置,本来就是司马迁原著之文。至于张文虎所说,“案钱说甚辨,而今传本皆同,可以据改,并仍旧贯”云云,这种议论,并无任何实际价值,故无须讨论。这样,钱大昕和张文虎的议论,并不能证明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上的“干支纪年”专项栏目,是所谓“徐广所增注”的注文,与此相反,恰恰只能证明是司马迁的原著之文。

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父子两代相袭,“相续纂其职”为太史公,掌管着西汉皇家藏书府库“石室金匱”中的珍藏典籍和国家档案。青年时代,还“学于天官唐都”,而通晓天文历法。因此,他和太中大夫公孙卿、壶遂等上书汉武帝,“言历纪坏废,宜改正朔”。这个倡议被汉武帝采纳,正式命令由司马迁和公孙卿、壶遂等主持,组成有天文历法专家邓平、司马可、酒泉侯宜君、司郎尊和巴郡隐士落下闳、方士唐都等数人,组成一个天文观测和历法研究的科研班子,共同攻关,终于完成了中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最精密的阴阳合历的《太初历》的制定工作。这样,我们再来看司马迁在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前的叙述:“太史公读《春秋历谱谍》,至周厉王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呜呼,师挚见之矣!”从司马迁的这番话来看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,起自“共和元年”,并以“干支纪年”,亦决非出自于他的杜撰。乃是由师挚等“历人取其年月”,早已著成《春秋历谱谍》,这一周历的专著,而流传下来,为司马迁等所亲见,并据以撰述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。众所周知,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,就是由共和元年开始的。考其由来,就是由于《春秋历谱谍》以干支纪年,为历史编年的结果。从这一历史事实来看,准确地说来,中国使用“干支纪年”的上限,决不始于周考王十四(公元前427)年,而是早在415年之前的共和元(公元前841)年,就已经开始使用,至今已有2830年之久的确凿历史可考。

六、结语

总结本文的考察、考证与探讨,似可得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:

一、中国自殷商时期,就已经发明了阴阳合历的殷历历法。自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,秦晋以至秦、韩、魏等国广大地域,从“三正论”来说,不论为“建丑”、“建寅”,还是“建亥”,都是殷历历法。至汉武帝太初元(公元前104)年,由司马迁等主持改历,制订《太初历》以来,这种阴阳合历的殷历历法,一直推行到现在。

二、根据司马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、《管子·五行》、《夏小正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的记载,中国自周厉王,即共和元(公元前841)年以来至春秋末或战国初,至少在周、鲁、齐等国的广大地域,皆曾用十月太阳历的周历历法。这种历法,似即为聚居于川、滇的彝族、傈僳、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所采用的彝族太阳历,至今已有2830年之久的历史可考。

三、殷商时期以前的夏代,使用的历法是十月太阳历的周历历法,还是阴阳合历的殷历历法,尚须从我国丰富的文字材料——古籍记载和地下埋藏的瑰宝——出土文物,进行深入地考证研究,以期彻底阐明。

(作者何爱华,1925年生,黑龙江省中医学院基础部副研究员)

[责任编辑:刘爽]